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余运江, 高向东, 郭 庆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 要: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 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 社会融合度较高, 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 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 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 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 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关键词: 新生代; 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上海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1-0057-08

Research o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New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

YU Yun-jiang, GAO Xiang-dong, GUO Qing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Institution of Population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ghai,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s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terminants. We found the structure dimens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clude economic adaptation, social inclusion,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mind;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s high, but integration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 social integration ar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factor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artical determina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economic factors is no longer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social integration, but it presents a complex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intergration. Institu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收稿日期: 2011-08-25; **修订日期:** 2011-11-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1JZD0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87304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1JJDZH001);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DFA080074)。

作者简介: 余运江 (1988-), 江西宜春人,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社会学与人口地理。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hanghai

一、引言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261386075 人,同“五普”相比增长了 81.03%。而新生代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半壁江山^[1]。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就业层次低、流动性大、务农经验缺乏、渴望融入城市等特点,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及附加在上面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性因素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导致其很难融入移居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9]。流动人口内部已经不是一个高度均质的群体。朱宇认为年龄和代际的差异只是农民工分化的一个方面,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在融入城市能力和意愿上的差异也必须引起重视^[10]。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很多学者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很少系统全面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是否有所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有哪些?是否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因素相同或相似?这些问题有利于全面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因此,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

关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王春光首先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1990 年以后初次外出的打工人员^[11];刘传江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 1980 年以后出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12]。虽然二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有所差异但都包含了农村人口、年轻人口、外出就业这三个特征。基于此,本文把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下文简称新生代流动人口,但引用他人文献时保持原文的提法)界定为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户籍为农村户口的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外出打工或经商的流动人员。

二、研究设计

1. 测量指标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自杀时最早提出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概念^[13]。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学者帕克(R. E. Park)提出的“社会同化”理论认为:移民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越来越多的移民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了主流族群,进而被主流社会完全同化^[14]。任远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15]。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国外学者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国内学者也采用了许多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融合度及结构维度的测量指标。从社会融合的定义、过程、指标建立来看,社会融合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因此,本文在选取指标时将国际移民社会融合指标的构建与国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维度相结合,从以下 12 个指标来衡量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索其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具体指标为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是否办理居住证、参与娱乐活动的频率、和本地人沟通难易度、本地文化认同度、本地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居留意愿程度、身份认同程度、歧视与偏见行为的感受度。指标具体操作化测量如下:收入满意度,指在移入地收入和移出地收入相比是否满意,分为:①“不满意”;②“差不多”;③“满意”。其余指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设计。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相关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分别将指标选项设为分值以计量各项标的得分,以此方法类推并将12项测量指标得分的加总值作为社会融合度的统计值。采用因子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将原有的12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综合成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并对其命名,这几项综合指标代表了原有因子的大部分信息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社会融合度分值则以这几项综合指标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综合指标也做了同样的转换,得出具体的分值。

在探究影响城市新移民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具体影响因素中,文章将性别、年龄、教育、婚姻、职业状况、就业状况、月收入(包括福利奖金等收入)、住房状况、是否办理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满意、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12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以社会融合度为因变量分别引入线性回归方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高向东教授主持的上海市宝山区、奉贤区和松江区流动人口课题组调查数据。世博后,上海流动人口进一步向远郊区集聚^[16],宝山区、奉贤区和松江区位于上海市的远郊区,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调查由当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采用PPS抽样调查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选取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及自填式问卷的方式,这样就使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且减少了抽样误差。问卷调查对象1010人,有效问卷920份,有效回收率为91.1%。

3.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调查样本中,女性360人,占39.1%,男性560人,占60.9%,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980~1990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平均年龄为25~26岁。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居多,占63.0%;其次是初中学历,占17.4%;大专以上学历占16.3%。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者360人,占39.1%;未婚者530人,占57.6%;离婚、丧偶者总共30人,占3.3%。从职业状况来看,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无固定职业者所占比例较多,国家社会管理者或经理人或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很少。其他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基本特征				%
变量		构成		
年龄			3000~4000	23.9
	15~19	6.6	4000以上	30.5
	20~25	47.8	职业状况	
	26~30	38		
	30~31	7.6		7.6
受教育程度	小学	3.3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经理人员或私营企业主	
	初中	17.4	专业技术人员	14.1
	高中	63	办事人员人员	13
	大专以上	16.3	个体工商户	6.5
月收入			商业服务业员工	18.5
	1000~2000	4.3	产业工人	2
	2000~3000	41.3	农业劳动者	2
			无固定职业者	14.1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1.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结构维度

为了更好地获取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首先对前面所述的12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考察),结果发现是否办理居住证、参与娱乐活动的频率、和本地人沟通难易度与其余各项指标的相关系数 $|r| < 3$,表示是否办理居住证、参与娱乐活动的频率与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弱,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故在下面的因子分析中排除此变量。其余9项指标相关程度较高,KMO统计检验值达到0.79,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值(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为1211.8(Sig=0.00),这表明上述9项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其余的9项社会融合指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主成分提取,根据统计学意义上的惯例,通常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进行命名。统计结果表明有三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它们的值分别为2.65、1.72和1.10,因此,确定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子个数为3。

对上述3个主成分进行命名是因子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第一个主成分特征值过大,而第

二、三主成分特征值过小，使得因子命名缺乏解释性。为了更好地对因子进行命名，文章采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 5 次后收敛。这样就得到了各个测量指标与主要因子之间的载荷重量（见表 2）。

根据表 2，是否受到偏见与歧视行为（0.83）、身份认同度（0.81）、本地文化认同度（0.77）、本地价值观接受程度（0.54）四项度量指标与 F1 载荷因子密切相关，而这些指标与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把 F1 命名为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F2 载荷因子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0.67）、居留意愿程度（0.64）二项测量指标密切相关，这些指标代表了社会接纳和制度安排，因此，文章把 F2 命名为社会接纳因子。F3 载荷因子与工作满意度（0.83）、住房满意度（0.79）、收入满意度（0.57）密切相关，经济基础和状况决定了这三项指标的满意度，文章把 F3 命名为经济适应因子。

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社会融合的因子结构由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社会接纳因子、经济适应因子组成，三个因子共同解释了总量达 69.74% 的方差变异。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解释的方差最多，占 27.81%；其次是社会接纳因子，占 23.51%；最后是经济适应因子，占 18.42%。这三个因子也就代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三个结构维度。

2. 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

在已有的社会融合相关研究中，一般构建社会融合评价指标后对各个指标得分权重基本都采用等权重法或专家评分法。本文采用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社会接纳因子、经济适应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按 100 分为标准分进行转换。得到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为 58.4 分（标准差：15.3），文化与心理融合度为 53.7 分（标准差：20.0），社会接纳度为 65.9 分（标准差：19.4），经济适应度为 59.5 分（标准差：22.2）。这说明上海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较高（即相对上海市民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合水平过“半”）。

从主要载荷因子得分情况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接纳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度，文化与心理融合度最低。这说明上海市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适应方面速度最快，在文化与心理融合方面速度最慢。

从各个主要载荷因子的内部差异来考察，经济适应因子内部差异最大，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差异其次，社会接纳因子差异最小。这说明来沪新生代流动人口对于上海社会制度安排的满意度较高且内部差异不大，但经济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很大，说明来沪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严重两极分化。

3. 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文章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把影响因素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特征；二是经济因素；三是制度安排。

（1）个人特征与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个人自然社会特征基本要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时间等因素。考虑到多个影响因素纳入回归模型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此，文章把社会融合度当作因变量，选取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年龄、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以文盲为参照组）为自变

表 2 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因子载荷

通过检验的变量	F1 文化与心理融合 因子	F2 社会接纳 因子	F3 经济适应 因子
居留意愿程度	-0.28	0.64	0.19
收入满意度	0.37	0.30	0.57
工作满意度	-0.31	0.21	0.83
住房满意度	-0.24	0.31	0.79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0.13	0.67	0.27
本地文化认同度	0.77	-0.21	0.38
本地价值观接受程度	0.54	0.35	0.48
身份认同度	0.81	-0.33	0.36
偏见与歧视行为	0.83	0.37	-0.45
方差贡献率（%）	27.81	23.51	18.42
累计方差贡献率（%）	27.81	51.32	69.74

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3)。调整判定系数达到0.82且通过检验,因此,此模型适合用于分析。

性别变量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显著的影响。研究表明性别变量(以男性为参照组)对社会融合有着正向的影响,即女性比男性的社会融合意愿更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有着强烈的团聚和陪伴的需要,一旦定居,她们会更加积极地将亲属接到身边。出于安定生活的考虑,女性也可能比男性更倾向于将收入投入到购置房产上。此外,同男性相比,女性通过婚姻的方式来直接提高经济融合程度的条件也更加便利^[17]。

教育变量(以文盲为参照组)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在个人特征中,教育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流入地的融合程度越高。样本统计频率表明上海市新生代流动人口大部分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因此,其整体社会融合程度也较高。

婚姻变量(以未婚为参照组)对社会融合有着负相关影响,即未婚者比已婚者的社会融合程度更高。婚姻会带来重要的亲缘和血缘关系,以强关系为主要交往圈的农民工更可能依赖强关系^[18]。已婚的农民工中大部分是配偶在居住地,和家里的联系较多,而未婚者更可能与市民来往,其社会融合度也较高。

年龄变量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关系并不显著,没有通过检验。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一个较均质的群体其内部年龄差异没有体现出社会融合的差异。他们普遍有着教育、就业、婚姻等社会需求,但现有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文化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限制着年轻移民的社会融入,现实社会需求与滞后的城市服务体系、融入城市的主观愿望与城市社会的客观排斥之间形成深刻的社会矛盾^[19]。

(2)经济因素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经济因素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居住,即要有栖身之地;二是就业,即要能有维持一定的生活源泉。这是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立足、生存的基本前提和保障^[20]。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就业状况、职业状况、住房状况、月收入四个方面。因此,本文把社会融合度当作因变量,选取就业状况(以未就业为参照变量)、职业状况(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组)、住房状况(以租住私房为参照组)、月收入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4)。

就业状况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关系呈现正相关且非常显著(显著水平为0.006),这表明在移入地参加工作比未参加工作的社会融合度更高。同时流动人口在移入地越早就业就越有利于社会融合。但是,现行的城市就业制度与户籍仍有密切的关系,就业制度的公平和公正性还没有完全体现。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21]。

职业类型(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组)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样本数据表明来沪新生代流动人口大多数是商业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无固定职业者,商业服务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大都工资较低且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在经济适应、心理与身份融合方面较低。而无固定职业者虽然与本地人交往较多,但由于其经济基础不稳定,在居留意愿与心理文化认同

表3 个人特征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Sig
性别	0.91	0.097	0.035
教育	1.19	0.051	0.007
婚姻	-0.31	0.082	0.041
年龄	0.11	0.016	0.055
constant	1.621	0.515	0.002
调整的 R ² = 0.82		Sig = 0.000	

表4 经济因素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Sig
就业状况	0.21	0.041	0.006
职业类型	0.18	0.022	0.043
住房状况	0.5	0.037	0.007
月收入水平	10.6	0.01	0.001
Constant	2.321	0.196	0.000
调整的 R ² = 0.79		Sig = 0.006	

方面低于从事其他行业的流动人口，因此，社会融合度较低。

住房状况（以租赁住房为参照组）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呈正相关，即住房状况越好且越满意，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越高。具有稳定的住房不仅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前提，而且住房状况是社会地位在空间上的显性表现。与本地市民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从居住的区位、聚居模式、房屋状况各方面来看，其居住都处在一个空间分异、社会隔离的状态。

在经济因素中，月收入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重要。根据调查数据，移入上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为 3349 元，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其在城市的生活和居住状况就越好，更有利于融入城市，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自我角色的认同也会随之提高，行为和心理就更有可能从“农民”转变成为“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收入水平表现出更加线性的作用，即收入水平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更具有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着更为强烈的社会融合意愿并且他们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较为认同。

（3）制度安排与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体系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障碍因素，为了更好地探究制度安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本文选取是否办理居住证、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满意四个代表性的因素。文章把社会融合度当作因变量，把上述四个因素当作自变量并线性回归（见表 5）。

是否办理居住证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居住证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明显高于没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居住证的办理人口主要为各类高级人才，要求有较高的学历与纳税条件等，低学历的农民工基本上排除在居住证办理人员之外。上海居住证制

表 5 制度安排与新生代乡 - 城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Sig
是否办理居住证	0.11	0.052	0.036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0.31	0.083	0.000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0.12	0.062	0.068
基本公共服务是否满意	0.03	0.099	0.007
Constant	0.93	0.333	0.006
调整的 R ² = 0.86		Sig = 0.004	

度避开户籍制度的坚固藩篱，柔性解决了引进外来人口的城市身份和待遇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另一方面是流动人口居住证的办理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居住证的办理者有希望从“外来人”向“本地人”转变。在户籍制度开放的假设前提下，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会大大增加，并且举家迁移的长久居留的人数也会增多。

参与社会保险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有社会保险的人比未参加的社会融合度要高很多。这说明社会保险或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更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能获得社会保障的程度很低，又脱离了流出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样本数据表明，不清楚自己是否具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高达 31.1%。而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如何衔接的问题。2010 年 7 月开始生效的《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标志着在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险转接问题上走出了重要一步^[22]，但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险仍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签订劳动合同对促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当前农村地区的外出人员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大大增加，样本数据也表明近 90% 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都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然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不重视通过劳动合同等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劳动合同成为“一纸空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满意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满意直接影响到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意愿和居留程度。政府应加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财政供给,实现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虽然有较好的财政状况和较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但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的统计结果与分析,可以得到关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因子结构、现状、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初步结论。

1.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子结构由经济适应因子、社会接纳因子、文化与心理融合因子构成。因此,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至少包括这三个维度。社会融合的三个结构维度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实际过程中这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23]。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各维度有重叠也会出现不同的次序,谁先进行谁先结束很难认定,各维度间的渗透十分正常。但可以肯定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任何两个或多个因子之间都难有整齐划一的、单项的线性因果关系。

2.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文章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各个因子的权重,然后赋予不同的值得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为58.4。新生代流动人口在上海已经达到“半”融合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上海有着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规范的制度、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社会融合内部差异较大,标准差达到15.3。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精英阶层或许和本地居民基本上完全融合了,流动人口的弱势阶层连“半”融合水平都未达到。这种内部差异较大的社会融合水平,其质量有待提高。

从社会融合的不同维度考察,社会接纳维度最高,文化与心理融合维度最低,两个维度之间相差12.2,这表现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各个维度之间进展不平衡,同时也表现了社会融合质量不高。政府导向型的干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或者实现融合的过程^[24]。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在启动户籍改革、完善社会保险、规范就业市场等政策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政策的出台毫无疑问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但政府在“有为干预”的同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和各个维度之间的差异,政策的实施对象应当向新生代流动人口中的弱势阶层倾斜,政策的主要内容不应局限于社会接纳维度方面,也要更多地关注文化与心理维度方面。

3.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主要受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制度安排的影响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多因素所决定的复杂过程,社会融合水平受到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状况、月平均收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12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个人特征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社会融合度高;未婚人口比已婚人口社会融合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社会融合度高。

经济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最为复杂,表现出非单一的线性关系。一方面,就业人口比未就业人口社会融合度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经理人员或私营企业主比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社会融合度高;已购商品房的人员比租住私房的人员社会融合度高;收入高的比收入低的社会融合度高。另一方面,经济因素中特别是收入水平和职业状况对制度因素、个人因素产生显著影响,样本数据表明收入水平高和职业状况良好的基本上都办理了居住证、签订了劳动合同、拥有社会保险、

参加职业培训。

制度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拥有居住证、办理社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满意基本公共服务对社会融合度都呈现正相关,特别是社会保险的相关度最高。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受年龄、教育程度、城市生活方式认可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有着强烈的社会融合意愿,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社会融合的步伐。新生代流动人口能否实现社会融合首先需要的是给予他们政策上的支持,如果不解决政策上的公平他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

4. 相关思考

虽然本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建立回归模型等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笔者深感研究中有一些不足,有许多值得商榷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本文通过选取一些相关指标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进行定量分析,但指标仍然过多,能否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的测量指标?二是本文的研究是某个时间点的静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时间的延长,他们的社会融合度必然会发生改变,如何控制时间变量进行纵向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马学阳.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J]. 人口与经济, 2011, (4).
- [2] 刘传江,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 2004, (5).
- [3] 邓大松,胡宏伟. 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6).
- [4] 杜鹏等. 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J]. 人口研究, 2005, (4).
- [5] 杨菊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0, (2).
- [6] 彭华民.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J]. 南开学报, 2005, (1).
- [7] 宋月萍. 社会融合中的性别差异: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6).
- [8] 靳小怡,彭希哲等.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J]. 人口与经济, 2005, (5).
- [9] 许传新.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 南方人口, 2007, (4).
- [10] 朱宇.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 人口研究, 2010, (2).
- [11]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12] 刘传江,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 2008, (5).
- [13] Park, R. and E.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 [14] Schwarzweller, H. K. Parental Family Tie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64, (4).
- [15] 任远,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10, (3).
- [16] 高向东. 上海远郊区流动人口集聚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2).
- [17] 张文宏,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 (5).
- [18] 李树苗,任义科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8, (2).
- [19] 刘建娥. 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J]. 人口研究, 2010, (7).
- [20] 王桂新,张得志. 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12).
- [21]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 [22] 朱宇,林李月.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 地理科学, 2011, (3).
- [23]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 (6).
- [24] 同[15].

[责任编辑 方志]